

日本语言文化研究生导师丛书



日语文体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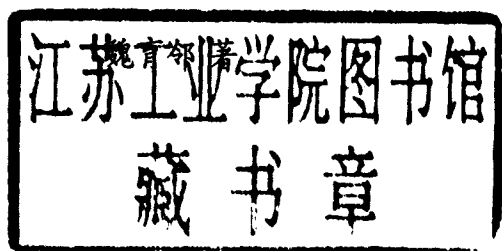
魏育邻 著



吉
林
教
育
出
版
社

日本语言文化

日语文体学



吉林教育出版社

(吉)新登字 02 号

日本语言文化研究生导师丛书:日语文体学

魏育邻 著

责任编辑:张岩峰

封面设计:王 康

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5 印张 199 000 字

发行: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册

定价:12.50 元

印刷:吉林省吉育印业有限公司

ISBN 7-5383-3994-9/G·3623

丛书序言

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一群有志于日本语言文化研究的教授、博士的组织策划和吉林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日本语言文化研究生导师丛书》从2002年起陆续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随着学科的发展,我国的日本语言文学学科正在不断走向分化。在传统的学科基础上,新的学科在不断产生。本丛书所涉及的课题有的在国内目前还是空白;有的处于刚起步阶段;有的虽有前期研究,但已不能反映最新的研究成果。为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首期推出《日语文体学》、《日语句法学》、《日语词法学》、《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化史》5种,希望在巩固和建设传统学科的同时,在新产生的学科领域中有所作为。

本丛书是一个开放式的研究系列。随着学科的发展和分化,丛书课题内容将不断充实扩大,并且各课题都具有可持续研究、且不断深化的研究前景。语言文学学科正处于一个深化和发展的阶段,这一趋势为探索新的研究课题提供了机会,而新的探索和研究又可以进一步推动学科的发展。本丛书的目标是:

1. 反映更新的研究成果。尽最大可能采用原始的、第一手的资料作为参考,力求全面地、丰富地反映本课题领域的新的研究成果。

2. 吸收更多的学科领域。一方面要分化和扩大日本语言文

学学科的范围本身，另一方面力争将文化、历史、社会、民俗等领域也纳入进来。

3. 成为更好的学习研究参考。通过本丛书的研究，使日本语言文学学科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提高。并希望本丛书能成为日语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日语教师的有价值的参考书。

以上目标能否达到，还望广大读者指正。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陈 访 泽

2002 年元旦于白云山麓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日语文体的分类.....	(1)
第二节 文体学与文体学的方法.....	(6)
第二章 日语语音的文体功能	(13)
第一节 语音语调与表达效果	(13)
第二节 拟声	(22)
第三节 语音与意思的联系	(29)
——清浊音的对立现象与意思	
第四节 双关	(36)
第五节 节奏	(41)
第三章 日语词语的文体色彩	(48)
第一节 和语 汉语 外来语	(48)
第二节 口语体与书面语体	(58)
第三节 标准语体与非标准语体	(61)
第四章 日语句子的结构与文体	(71)
第一节 长句与短句	(71)
第二节 简单句与复合句	(75)
第三节 正序句与倒序句	(82)
第四节 重头句	(86)
第五章 日语句子成分的排列方式与文体	(89)
第一节 倒装句	(89)
第二节 对偶句	(92)

第三节	反复句与连锁句	(93)
第四节	列举(列叙)句与递进句	(97)
第五节	名词结句句	(100)
第六章	日语的语言文体	(102)
第一节	汉文体与和文体	(102)
第二节	敬体与简体	(111)
第三节	文章体与口语体	(120)
第七章	日语的体裁文体	(130)
第一节	书信文体	(130)
第二节	公文文体	(136)
第三节	新闻报道文体	(145)
第四节	广告文体	(151)
第八章	日语小说的语言特征	(166)
第一节	小说中的叙述与叙述观点和人称、时态	(166)
第二节	小说中的对话	(174)
第三节	小说中的风景描写	(180)
第九章	日语的个人文体	(187)
第一节	个人文体的成因——表达态度	(187)
第二节	个人文体成因的具体文例分析	(190)
第十章	现代日语文体学的理论流派与方法	(203)
第一节	小林英夫的语言美学	(204)
第二节	文章心理学	(215)
第三节	桦岛忠夫的统计学文体学	(234)
附录		(245)
后记		(262)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日语文体的分类

对于现代日语的文体，日本学者一般将之分为两大类：“个人文体”和“类型文体”。所谓“个人文体”，指的是文章表现出的作者的个性特征。这时既可以以某个具体作者为对象来把握，如“夏目漱石的文体”，也可以以某一具体作品为对象来把握，如“《细雪》的文体”。就个人文体而言，我们以为不存在什么需要质疑之处，只是在研究个人文体时，存在两种基本不同的立场：一是文学文体学的立场，即从文学批评的需要出发，将个人文体的研究，作为解释某一作家思想、性格或某一作品主题、风格等的手段；二是语言学文体学的立场，即奉行语言学研究的宗旨，运用语言研究的种种手段和方法，着重分析不同作家或不同作品的语言特点、语言风格，并努力从中归纳出若干“作家类型”或“作品类型”来。可以说这种研究，有些类似于我们中国的修辞学研究中的“风格研究”，即从对语言材料、表达方法等物质手段的分析入手，归纳出若干组相对立的风格类型：“源氏物语派”和“非源氏物语派”，“用言型”和“体言型”，“修饰型”和“非修饰型”等等。在此必须顺带说明的是，本书的论述立场，以及所介绍和分析的有关文体学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属于语言学文体学的范畴。

而所谓“类型文体”，则是着眼于文章的类型性的特征，将

文章分为“汉文体”和“和文体”、“文章体”和“口语体”、“简体”和“敬体”等，以及分为“小说体”“书信体”“广告文体”“新闻报道文体”“论说文体”“科技文体”……显然，这种类型文体的划分范围过于宽泛，而且它们的分类标准也不一致，比如“汉文体”和“敬体”等，主要是根据它们运用语言的特点不同分类的；而“书信体”“科技文体”等，则主要是按照它们的社会交际功能的不同分类的。这也就是说，两者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反映的是使用语言时表现出的不同特点，而后者表示的是文章各种不同的体裁样式、体裁类别。用一种通俗易懂的说法来说明它们不同的性质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说用“汉文体”或“敬体”写了一篇文章，却一般不可说用“书信体”或“科技文体”写了一篇文章。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对类型文体进行“下位分类”，即一分为二为：在此不妨称之为“语言文体”和“体裁文体”，这样一来，加上上面提到的“个人文体”，我们所要处理的“文体”实际上共有性质各异的三种。那么，这三种“文体”相互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日语的语言文体指的是一系列的不同用语特点的综合体系。它们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比如“汉文体”和“和文体”主要是通过历史的发展演变而形成的，而“文章体”和“口语体”则主要是在现实的不同领域的社会交往中，由于对象、内容、目的和环境的不同而形成的。无论它们的成因如何，语言文体是在人们的社会交际过程中产生的。我们知道社会活动内容复杂多样，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交际关系，于是人们为了在不同的交际活动中达到不同的交际目的，就必须使用相对不同的语言手段，这样便产生了语言文体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对语言材料的选择运用上，因为每一种具体的语言文体，都会在整个语言材料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语音、词汇、语法形式、句式和表达方

式，以显示出一定的文体特色。反而言之，一定的文体一经形成，它又会反过来制约语言手段的运用，使其符合和体现一定的文体特征，否则就会显得“不伦不类”，影响交际效果和表达效果。由于语言文体是一种语言表达体系，是因历时的、共时的原因而形成的语言功能的变体，所以它和体裁文体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体裁文体指的是文章的体裁样式、体裁类别，主要着眼于篇章结构和文章的总体功能，其构成因素，包括作者的写作意图、题材内容、结构形式、语言表达方式及其社会功能等，它虽然也包括运用语言材料的问题，但这不是决定的因素。比如一封书信，我们既可以用文章体来写，也可以用口语体来写；但反过来，我们恐怕绝不可能用书信体来写一篇学术论文或时事新闻报道。因此语言文体和体裁文体是有明显的区别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它们又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体裁文体作为一种次语境，对于语言文体具有选择功能，而语言文体作为一种表现体系，对于体裁文体又具有限制作用。具体地说，就是某种体裁文体往往会比较固定地选择一两种语言文体为己所用，如书信体往往选择敬体，而学术论文体则为汉文体和简体……；反而观之，某种语言文体则往往比较适合于若干种体裁文体，如和文体就适合于小说体、书信体（个人的社交书信）、乃至广告文体……因此，研究语言文体不可能不涉及体裁文体，而研究体裁文体也不可能不谈论语言文体。

至于个人文体与语言文体、体裁文体的关系，似乎不难讲得清楚。首先，我们有必要对个人文体下这样一个定义：个人文体是某个具体个人在语言和语言之外的多方面因素的联合制导下，自觉不自觉地有分别、有选择地运用整个语言材料和表达方法时所显示出来的个性特征的综合体。然后，我们在此暂不讨论个人文体的主客观成因，只分析它与语言材料的运用、表达方法的选

用的关系。所谓语言材料的运用和表达方法的选用，我们认为其中就包括了（虽不是全部，但是主要的部分）对语言文体和体裁文体的选择。首先，毋庸置疑的是，任何一个作者写文章总要事先选定一种体裁，或书信，或小说，或评论，或广告文稿……除非在十分特殊的情况下，他（她）不可能故意写出一篇“非驴非马”的东西来。因此，个人文体和体裁文体的关系是比较清楚的：个人文体首先是一定的体裁文体制约下的个人文体。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人一生只用一种体裁文体写作，但也不可想象一个人可以自如运用任何一种体裁文体，或者说数种体裁文体的文章都写得一样好，比如小说家三岛由纪夫就写不好内阁大臣的“演讲稿”^①。所以，我们研究个人文体时，总是以该作者写作的主要的一两种体裁文体为对象的。比如，我们说的“夏目漱石的文体”，不言而喻主要是针对他的小说而言的，而不可能是他的个人信件之类。这恐怕也是为什么个人文体研究往往总是以业已“成名成家”的作者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所在。因为你只有将某一种体裁文体运用得比较自如、比较得心应手了，才能显示出自己的特色——“个人文体”来。

那么，在一定体裁文体的语境范畴内，“个人文体”是如何得以显示出来的呢？这就是一个与如何运用语言文体有密切关系的问题了。我们知道个人文体的主客观成因是多方面而复杂的，但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研究个人文体，无可置疑的一点是，首先必须从辨别具体作者在其作品中选用了什么样的语言材料和表达方法，分析这些语言材料和表达方法的结合形式以及所产生的表达效果入手。当然，这种辨别分析不仅限于语言文体的运用问题，还包括了从用词、组句到布局谋篇的一系列问题，然而不可否认选用语言文体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首先，以“敬体”（です・ます調）和“简体”（だ・である調）的问题为例，从整体

上来说，它们在日语文章中出现和逐步固定下来，就与所谓“言文一致”的现代文体的建立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②而就个人而言，明治前后“言文一致”运动的许多先驱者们，在这方面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比如，二叶亭四迷虽从“です調”出发，但最后选定了“だ調”，写出了小说《浮云》这样一部“言文一致体”的开山作；而山田美妙却正好相反：先尝试了“だ調”，最后将自己的文体定在了“です調”上，写出了在文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武藏野》；至于尾崎红叶则成功地运用“である調”写出了《多情多恨》，起到了推动“言文一致”运动发展的作用。其次，再来看看“汉文体”和“和文体”的情况。我们知道日语原来是没有自己的文字，后来日本人通过接触汉文汉字，开始掌握了文字、文章这样的记录手段。因此，日本最早的文章乃是中国的汉文。开始日本人原封不动地使用汉文作为记录手段，但后来日本人出于自身的需要，就如同他们将汉字改造变形为“仮名”一样，对汉文也进行了有意无意地改造变形的工作。这样便形成了各个时期不尽相同的却是以汉文为基调的文章式样——“汉文体”。“汉文体”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在日本一直是一种官方的、正式的、格调庄雅的文体。及至平安时代“和文体”的出现并站稳脚跟，才打破了“汉文体”的“一统天下”。于是，自那时起，日本便形成了“汉文体”和“和文体”的两大系谱，一直延续至今。“和文体”的性质正好与“汉文体”相反，是一种私人的、非正式的、格调轻松的文体。也可用“男性文体”和“女性文体”或“硬文体”和“软文体”来大体地区分它们。由于有两种文体基本上“泾渭分明”的区别，使得自古至今的作家们总不可避免地要在它们之间做出自觉不自觉的选择取舍。研究这种选择取舍的原因，乃是个人文体研究的一个重要而饶有趣味的课题。不用说这种原因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其中

主观因素是主要的方面。因为，对于处于同一时代的作家来说，在客观因素基本没有差别的情况下，作家的个人条件——出身、文化教养、社会地位、生活境遇、思想感情等都是决定他（她）的文体“汉”“和”倾向的因素。比如，鸥外的汉文调文体，很大程度上就可以从他出身于旧武士家庭、自幼接受严格的汉学教育、成人后仕途通达官至军医总监等方面加以说明。而有的作家则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动及随之思想感情发生变化等原因，而造成文体风格上的明显变化。比如从东京迁居关西后的谷崎润一郎一改往昔的汉文文体，写起“和味”十足的小说来了。^③再其次，不同的作家或者相同的作家由于不同的表达需要，在“文章体”和“口语体”的选择使用上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性，比如，比较一下夏目漱石的《草枕》和《我が輩は猫である》或《坊っちゃん》，就可发现前者属于“文章体”型的，而后两者则属于“口语体”型的。^④这种差异的产生，是由于作者根据作品的主题、情节、结构进行“文体创造”，即创造出符合特定的表达需要的文体的结果。综上所述，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敬体”和“简体”、“汉文体”和“和文体”以及“文章体”和“口语体”的差异，乃是考察个人文体差异的三对主要尺度，在此尺度下其它许多相关的文体因素都可以找到各自大体的位置。当然，这不是在此用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只有留待下面有关章节再作探讨了。

第二节 文体学与文体学的方法

所谓“文体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各种文体的一门学问。而“日语文体学”，自然就是研究日语这一特定语言的各种文体的一门学问了。一般都说，“广义”上的文体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问，但具体落实到“日语文体学”，却恐怕还是更

多地称它为一门“年轻的”学问为妥。因为，在日本的语言研究史上，以文章为研究对象，那是近代以后的事情；而作为对日语文体的科学研究的“文体论”，则是近于五、六十年前，在西方的文体学理论的影响和刺激下，以适应日本国内对文章的科学研究的迫切要求为背景诞生出来的。^⑤今天，日语文体学是一个充满活力、具有广泛的研究领域的处于发展中的学科。首先，它有“语言学文体论”和“文学文体论”之分。前者构成日语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后者则是进行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另外，如前所述，还有“个人文体论”和“类型文体论”之分。这两对文体论之间的关系可以这么考虑：由于“文学的文体论”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必然以具体的审美批评为目的，它关心的是某一作家或某一作品的文体特色，研究文体与作家的思想、作品的主题等的内在联系，所以它的研究对象必然基本上限定在“个人文体”的范围内。而“语言学的文体论”则奉行“语言学”描写语言形态的使命，以研究“类型文体”为己任。当然，这并不是说“语言文体论”不研究具体作家、具体作品的文体，据我们的观察，其实日本的“语言学文体论”很大程度上也在研究“个人文体”，但是即便是这样的时候，它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从中归纳出个人文体的“类型”的，如谷崎润一郎的文体为“和文型”，而志贺直哉的文体则为“汉文型”云云。因此，可以说“语言学文体论”所关心的主要对象是“——的文体”，而非“——の文体”。不过，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即便是“语言学文体论”，它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学语言。这一方面是由于“文学语言汇集着语言的精华；文学文体集各类文体之大成”^⑥这样的根本原因；而且在技术上，文体学在选择研究素材时，必然得考虑素材的典型性问题，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将目光更多地放在那些“成熟的”作家的作品上。在这个意义上

说，尽管给“文体学”的前面加上了“语言学”这样的限制词，也无法切断它与文学的密切关系。因此，我们不妨将文体学（无论它是“语言学文体学”，还是“文学文体学”）视作一门跨越语言学和文学两大领域的学问。

谈到这里，在崇尚实用的今日，文体学难免被看成是一门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虚学”。毋庸讳言，谁若企望从文体学中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恐怕会令他失望。这一方面是由于前述的文体学本身的性质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它所研究的对象的性质所致。比如，文体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书面语言作品。当然，文体学并不排除声音语言作品，但实际上文体学将某个人的声音语言片断作为研究对象的情况是比较少的。即便原本是“有声有色”的声音语言作品（比如某人的讲话录音），一旦成为了文体学的研究对象，不但作者的音质、音量等生理因素，甚至连声调、语调以及抑扬顿挫的节奏等具有文体功能的语音因素都往往可能被忽略掉，而只剩下其文字记录稿。由于同样的理由，小说中的会话文则可以成为文体学研究的绝好材料。因为，小说中的会话文一开始就是经过了抽象化处理的“口语”，尽管其抽象程度有高低之别。因此，文体学中所讲的“口语体”与“文章体”之分，实际上是在两者都能以书面形式表达的前提下，相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声音语言作品——“口语会话”的抽象程度的高低深浅的差异而言的。文体学也涉及语音语调的问题，但它并不把问题只限定在“口语”，即声音语言的范围之内，而且它的主要目的也是力图究明语音语调的文体功能，即表达效果的问题。

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文体学的功用呢？我们无意也无需给它冠以什么“实用”的桂冠。因为若仅从“实用”的层次上考虑问题的话，恐怕人类生活会变得比现在黯然失色得多。在此仅想用人的服装做一个也许不太恰当的比方：人若只为御寒遮丑的

“实用”目的，则大可不必穿着笔挺的西服和各式各样款式新颖的流行时装。同样，语言的使用如果只满足于“听（看）得懂”“没有语法错误”的水平的话，那么不难想象人类的语言活动将比之于蜜蜂之间的信息传递高明不了多少。正因为人类的着装许多时候并非只为了或主要为了御寒遮丑之类的“实用”目的，所以人们在去参加诸如婚礼、宴会等社交活动时，总要穿上笔挺的西服，以显自身庄重和对邀请者的礼貌；而在平时，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又会根据自身的需要或爱好，选择穿用各款新颖的时装，以表现自己的风貌和个性。与此相同，语言同样要讲究“得体性”（也可称为“适合性”）和“新颖性”。如果说语法学教给我们语言的“正确性”的话，那么文体学就是教给我们“得体性”和“新颖性”的。首先是“得体性”的问题。语言“得体性”的存在理由主要在于社会交际的需要。就日语而言，同样一句催促别人立刻答复的话，因交际双方的地位的高低、关系的亲疏等因素，而有各种不同的说法：“すぐ返事せよ”、“すぐ返事して下さい”、“すぐ御返事を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と存じます”……而如果是书面语言（信件）则还有必要这样表达：“折り返し御返信を賜りたく、伏して御願い申し上げます”。其次是“新颖性”的问题。语言的“新颖性”主要与文学创作有关。比如“比喻”这种最常用的修辞方式，在文学语言中就尤为讲究“新颖性”。例如在新感觉派作家横光利一的小说《頭ならびに腹》中有这样的新奇的表現：“真昼である。特別急行列車は満員のまま全速力で駆けていた。沿線の小駅は石のように黙殺された”。另外诗歌创作更是语言的“新颖性”的“实验场”了。当然，在此必须顺带说明的是：语言的“新颖性”的问题，对于把日语当作外语来学习的我们来说，恐怕绝大多数人只好甘于充当“鉴赏者”，是切不可轻易躬亲“实践”的。这也即是我们之

所以要事先声明文体学并非那么“实用”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同着装的人时得体、以及时装设计和时装表演在人们生活中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巨大的社会魅力一样，文体学在语言学习和研究中有着不可取代的特殊作用和地位。

文体学的方法取决于它的性质。简而言之，文体学是研究语言表达特色的学问。无论是“个人文体”、“语言文体”还是“体裁文体”，之所以能称为“某某文体”，正是因为它具有有别于他人的表达特色。因此，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文体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比较的方法。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比较的目的大体上有二。一是通过比较，显示出某种文体的特色。可以说任何一种文体都是以基本词汇、基本句式和基本表达方式为主要组成成分的。这些基本的语言成分构成了某种语言的“共核”，即各类文体都必须使用的“共同语”。很难想象某种文体的语言成分与其他文体完全相异，只能说是“大同小异”而已。正因为是“大同小异”，比较才有基础，比较才有效果。苹果可以与鸭梨相比，却不能与大米相比，是因为苹果与鸭梨在性质上（同是水果）相同和外形上（大小、形状）相似，与大米却迥然相异。这种从“大同”中比较出“小异”的比较方法，常被使用于“体裁文体”的研究上。我们说“书信文体”庄重谦恭，就是通过将“书信文体”与“共同文体”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这样的時候我们必须承认“共同文体”的存在。比如，假若说“来て下さい”为“共同文体”的话，那么在“书信文体”中就有以下种种说法：

いらっしやい おいで下さいませ どうぞおいで下されたく御
願い申し上げます 御来車下された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御光
来の程をお願い上げます 御来駕賜りたく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
お出の程をお待ち申しております